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思想

钟启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见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和意识形态“术语革命”同时发生、相互促成的关键性文本。意识形态批判导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学界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提供关于意识形态概念实质的明确表述和清晰界定, 导致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理解上存在诸多争议, 但是应该不会有人怀疑这个文本对于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把握和阐释意识形态内在逻辑的特殊重要性。实际上,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一般的双重批判)中, 确立了肯定性的理论内涵。他们从生成根源、本质内涵、功能结构及其支配规律等维度, 深刻揭示了“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把统治阶级的思想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把观念装进头脑”等意识形态基本原理,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观念原则和精神理念。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历史唯物主义; 意识形态; 规律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1-0011-10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发生的“哲学革命”同时意味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完成了“术语革命”。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天才发现和科学阐释, “意识形态”获得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历史语境和批判内涵, 成为时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各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域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核心范畴、关键环节。一方面, 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形态》是集中阐释、系统表述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核心文本; 另一方面, 《形态》又被视为一个存在概念争议的重要文本, 因为人们“无法在这里找到一个正式的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明确定义”^{[1](14)}。由于比喻的模糊性和表述的多重性, 特别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批判在特指与能指之间的频繁互动, 使得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似乎难以在文本中获得明确规定和本质揭示。实

际上, 《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观虽然复杂, 但也不是没有表述逻辑的, 这个逻辑的主题就是“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既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个别批判, 也是对“意识形态一般”的整体批判, 并在这种否定性批判中确立了肯定性的东西, 揭示和阐发了意识形态的生成运行规律、本质内涵及其功能结构等基本原理。

一、意识形态的形成根源: 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

从《形态》第一卷的《序言》及其注释(编者补充的手稿中删去的话)中就能看出,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对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它们在自己的“咩咩叫声”和“哲学斗争”中已经触及了意识形态制造幻想、支配个人的历史性课

收稿日期: 2022-09-28; 修回日期: 2022-12-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原创性贡献及学理化、科学化研究”(21VSZ001)

作者简介: 钟启东, 男, 四川内江人, 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意识形态规律论, 联系邮箱: cjmy@pku.edu.cn

题。这种触及表明,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否定性的错误观念,而且人们总是要受到这样那样的错误观念支配。当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是不知道这些错误观念究竟来自何处的,正如他们不知道自己所谓的“批判的批判”也是错误观念一样。他们只是对各种不符合自己想象的“观念、想法、概念”感到不满而想“造反”,却又只是对这些范畴做了局限在观念领域的词句批判和概念抗议。

因此,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区别,它们都认为世界受观念支配,将思想和概念看成决定性的本原,不仅“相信这种思想的统治”,而且“相信他们的批判的思想活动一定会使现存的东西灭亡”^{[2](510)};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指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以会在自己哲学的夸夸其谈中陷入“纯粹的思想领域”,使其哲学批判沦为“耽于幻想、精神萎靡”的,仅仅是同“现实的影子”进行哲学斗争的“词句革命”,既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研究过并尝试离开“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从而始终为黑格尔体系的思辨结构所迷惑和束缚,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研究“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516)},从而没能揭示出意识形态幻想及其支配结构的物质关系和现实基础,导致他们不但错过了通往“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的唯物主义道路,而且让自身陷入意识形态幻想。

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首先批判费尔巴哈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为什么要把费尔巴哈作为批判开端?因为批判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有助于直接切中并进一步揭示青年黑格尔派“所有代表人物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而这又是“因为只有他(费尔巴哈——引者注)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2](514)}。那么,至少向前迈进的一步是哪一步?当然是指费尔巴哈在批判基督教神学和炸开黑格尔体系中作出的唯物主义贡献。关于这个哲学贡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高度评价道:“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

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2](112)};《神圣家族》则指出,正是费尔巴哈“揭露了‘体系’的秘密”^{[2](295)}。费尔巴哈揭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宗教世界是人的精神幻想,“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2](200)},并“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2](200)},揭穿了黑格尔哲学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秘密,在德国理论界展现出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批判的实证哲学前景。

不过,仅仅几个月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形态》紧接着表明,费尔巴哈既没有创立“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2](200)},也不可能“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因为费尔巴哈“向前迈出”的那一步,不过是“问题的提出”,而非“问题的解答”。而这个“问题”,又是指向“真正的唯物主义”,具有本质重要意义的时代问题。遗憾的是,虽然这个问题由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催生,但是从《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性评述来看,费尔巴哈不仅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及其蕴含的革命性意义。

这是个什么问题?马克思写道:“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3](261)}费尔巴哈虽然揭穿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却没有说明世俗世界何以产生宗教幻想以及人们又是怎样把这些意识形态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正如他“既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2](549)}那样,他只是宣布宗教颠倒了主词与宾词,却没有说明这个颠倒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原因在于,费尔巴哈既没有看到真正的主词是“现实的个人”,也没有“根据经验去

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也就不可能确立“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所以，始于费尔巴哈的神学批判、哲学批判以及针对他的“批判的批判”，一再错过“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不仅“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而且真正相信自身对这种抽象统治所做的哲学斗争“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3](263)}。质言之，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看到了意识形态作为幻想对现实的颠倒，却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颠倒，既没有理解这个颠倒的现实根源、发生机制，也没有理解这个颠倒造成的意识形态幻想如何支配着活人的头脑。所以他们全然不知自己的思辨抽象正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个“颠倒的世界”头脚倒置的观念产物，这些思辨抽象本身就是“颠倒的世界意识”，他们才会无限地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3](263)}，最终在看似革命实则保守的政治退却中沦为替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国家辩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联系原本”开展“副本批判”，坚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2](27)}，坚持到“政治经济学”中解剖“市民社会”及其造成的意识形态幻想，使意识形态批判走向了“哲学革命”和“术语革命”。这不仅解决了“苦恼的疑问”，而且破解了“历史之谜”“社会之谜”，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和物质基础，即“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其一，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现实个人生活过程观念的反映；作为“精神生产”，是对一定时代物质生产方式进行思维的观念产物，它是由一定社会时代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观念上层建筑，没有自身独立发展的历史外观。其二，如果在这种社会意识的精神生活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不过是说明人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并在这种颠倒中虚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关系，而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2](524)}。概言之，正是“颠倒的世界”决定并产生了各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其三，既然人是有意识的生命活

动，那么就像宗教构造了人的本质幻想却也在这种幻想中真实塑造了人的生命本质那样，意识形态虽然是“颠倒的世界意识”，但这并不表明它不能正立着对决定它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颠倒机制发挥能动作用。意识形态虽然没有独立发展的自身历史，但这既不影响历史领域充满意识形态，也不影响意识形态能够深入地影响乃至改变历史发展。其四，改变着自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之所以会同时改变着意识形态，正是因为意识形态一方面是被决定的，是从属于一定时代物质力量的思维形式、精神内容，另一方面又是人们借以意识到并力求克服这个时代物质对立关系和现实冲突的思维自觉、精神手段。这就意味着，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决定”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只是一个映射过程或者认识过程，毕竟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一般的意识和观念内容，正如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一般性作用那样。

二、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

意识形态究竟是怎样的特殊意识，究竟是怎样由经济基础派生构造起来的，怎样才能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制造出幻想，并让这种幻想被当作真相“塞进头脑”？回答这个问题涉及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即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本质规定和精神实质。这是学界争议最多的前提性理论问题。

人们依据对《形态》中相关表述的不同重视程度和阐发维度，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内涵作出了不同理解。“阶级思想说”认为意识形态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原则和政治诉求；“统治思想说”认为只有主导性、支配性的思想体系才是意识形态；“虚假意识说”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虚假观念、欺骗话语、伪善承诺；“颠倒标准说”认为那些构成对现实颠倒的思想体系就是意识形态；“整体结构说”认为意识形态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国家机器说”认为镇压性国家机器之外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等等。

虽然《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表述同样不够凝练明确,但是学界关于“物质精神决定精神生产”“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原理共识还是普遍确立的。然而《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没有这种确定性和共识性的便捷优势了。在一定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形态》乃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文献中的一个最具张力又殊为重要的核心概念。人们始终找不到一处关于意识形态“是什么”这个本质内涵问题的明确表述,以致有人责备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模糊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这当然跟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总是表现为意识形态批判有关。他们总是在否定性的批判中确立了某种肯定性、规律性的东西,使得人们在寻找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内容时证据较多,而当要对这个概念正面直接地予以本质规定时又唯恐强制解释而无从着手,感到支撑性文本不足、文献语境过于复杂,或者即便依靠某处表述确定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实质,又容易陷入同其他文本表述不同意涵的概念冲突之中。这归根到底还是没有把握到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内核,而主要又是因为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原则来分析和把握这个核心范畴,即没有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没有立足意识形态理解和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导致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晦暗不明。

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描述,应当到这个事物的生成过程中去理解和把握。既然历史是人的自我生成和发展过程,那么历史领域的意识形态同样也是人的自我构造和运动过程。考察意识形态的本质,应当从人的意识本质以及这个本质如何演变为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中寻求答案。这就需要从“现实的个人”这个逻辑开端和现实前提出发。一旦确立了这个开端和前提,“意识”就从“天国降到人间”。一方面,“意识”仅仅是“人的意识”,而且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525)}的意识,人们是自己观念的生产者;另一方面,“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25)},全部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

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519)}。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进步和交往发展,意识经历了从最初“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到生产效率提升后“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2](534)}的形态变化和内容丰富过程,逐渐摆脱单纯直观,愈发复杂抽象起来,并终于在私有制和国家形成后演变出了意识形态。

从“意识”到“意识形态”,是分工发展的历史结果。“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2](534)}分工在这个阶段构造出意识形态,是因为分工不仅包含着矛盾,而且包含着这些矛盾的抽象解决,而这又是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消费和生产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成为现实常态。当分工导致少数人剥夺大多数人的私有制后,“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也就成为特权等级的统治愿望,只要他们不想“消灭分工”、不想作为“剥夺者被剥夺”,就必须着手解决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现存矛盾。于是,一方面“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被社会发明出来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用于调和阶级矛盾、缓冲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国家并不能消灭阶级矛盾和斗争,它只是掩盖了矛盾、压制了斗争,在国家的政权之下依然“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2](536)},从而镇压、辩护和教化既不可避免又似乎理所当然——“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2](536-537)}。意识形态就这样被发明出来,国家就这样“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4](308)},意识形态和国家有着共同的物质前提与阶级定在,具有同源性和同构性,因而两者在终极意义上的消亡也将是同一个历史过程。

从这里就能看出,一种“意识”所以是“意识形态”,正是因为它“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在一个阶级争夺国家政权的时候,意识形

态声称这个阶级代表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只有这个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才能把这种共同利益实现起来；在这个阶级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意识形态除了继续声称这个阶级的利益普遍性之外，还会宣传论证统治阶级正在实现和发展着这个共同利益，并一再雄辩地表明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及其确立的社会制度，即便当下还没把这种共同利益普遍地实现和发展起来，历史也终将表明它是共同利益的最好维护者。当资产阶级要联合无产阶级摧毁封建制度的社会堡垒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这样说的——“天赋人权”“自由理性”“平等博爱”；当资产阶级在全球确立了统治地位后，即便“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157)}的异化现象愈发严重且不堪忍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可以视而不见，并在枪炮加持下到处推销“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以及“历史的终结”。这种意识形态叫卖和价值营销是如此的自负又致命，以致它梦想并要求着“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35)}，而一旦这个创世计划受到阻碍和挑战，资产阶级的财富梦幻有落空的威胁，“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意识形态的格言就会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2](509)}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意识”的独特内涵和本质规定，正是在于它是这样的社会意识：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无产阶级意识的区别也在这里，只不过由于无产阶级同全人类共同利益根本一致，所以这里的“说成”是将客观事实、历史规律深刻揭示和科学表述出来，是对真实问题的真正解决，而非虚构和颠倒。

三、意识形态的功能结构：把统治阶级的思想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它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的观念机制，这个机制是社会生活赋予的，特别是由阶级斗争的历史活动所结构起来的，因而意识形态同国家一样，都是由一定的经

济关系和阶级斗争所决定的社会现象及其历史过程。一旦社会制度不再采取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的观念建构方式，意识形态也就失去存在的社会前提了。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指明的意识形态消亡的条件，这个消亡条件同时也是对意识形态本质规定的再次确认，“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2](553)}。可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是意识形态构造自身的内在灵魂、发生机制，一旦这个发生机制失去了外在动力和物质条件，意识形态也就灵魂不在、空余肉身了。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伴随这个意识形态发生机制被取消的，还有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和权力机制，以及这个形式机制造成的阶级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统治的整个假象。到那时，与其说人们不再为统治的假象所支配，毋宁说人们不再承受任何统治。但是在这之前，在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阶段，不仅依托国家的政治统治是必然的，而且对于虚假共同体(比如资产阶级政治国家)来说，意识形态所制造的“思想的统治这个整个假象”本身就是不可或缺的统治。制造假象的统治同样是统治，这种统治通过制造各种假象来强化统治，这就是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运行法则和统治秘密。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在本质追求上是致力于争夺或者维系国家政权的统治事实。意识形态首先是作为国家支配个人的意识形态力量被统治关系明确和承认的，无论对于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抑或是革命阶级来说都是如此。意识形态深处是政权问题。从这里立即又可以引出这样几个问题来：其一，是否所有的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都会采取“制造假象”的方式？其二，是否所有的意识形态在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的过程中，都会造成“颠倒”和“幻想”？换言之，是否能把“颠倒的思想”“虚假的意识”“天真

的幻想”统统认定为意识形态?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就像不能把所有的阶级意识都称作意识形态那样,我们同样也不能把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定性为否定和消解的虚假意识。一方面,一种意识形态是否“颠倒”或者“虚假”,取决于构造这个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和阶级立场本身是否“颠倒”或者“伪善”。一种意识形态是否通过制造“假象”和“幻想”来进行统治,取决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跟人民群众是否有着实际一致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绝大多数时候都在否定性的理论原则中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并不表明他们关于意识形态本质内涵及其建构机制的规律揭示也是否定和负面的。既然他们已经指出“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是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每个力图赢得政权的阶级在初期不得不采取的历史行动,那么也就说明这里已经蕴含着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客观的意识形态原理,同时说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会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但这里不存在“颠倒”“虚假”和“幻想”。这既是因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295)},实现了阶级意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三者相一致;更是因为如果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对市民社会颠倒真相的颠倒性掩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由于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完全一致,可以说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颠倒的颠倒”,揭露了真相,破解了秘密,消除了幻想,还原了本质,扬弃着“信仰的异化”和“异化的信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要想真正完成这个批判和建构任务,就要首先将自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否则就会始终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统治,就会不断遭受来自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些特权等级的意识形态攻击。

这就把第三个问题抛了出来:意识形态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或者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从前面的讨论可知,正如并非所有阶级思想都是意识形态那样,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

都能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只有取得国家政权、确立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从这里开始,意识形态才能发挥统治功能和支配规律,于是它会力求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上升并确立为在社会意识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将自己确立为占主导地位、发挥统摄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问题在于,这个统治环节是如何推进和实现的?回到《形态》的相关论述来看,这里仍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例加以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550)}这就意味着一个阶级的思想、一种意识形态,要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首先要将自己提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使革命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发挥国家的意识形态力量。为此,这个意识形态就要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共同利益,并在观念表达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552)}。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这是每个革命阶级在初期为了争得统治地位而不得不选择的意识形态策略,但这并不表明这些被描述为具有普遍形式和意义的思想一开始就是“虚假的幻想”。实际上,“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因为进行革命的阶级从一开始是作为全社会代表出现的,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相一致^{[2](552)}。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在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僧侣贵族的历史阶段,文艺复兴反对神学束缚,宗教改革解构信仰权威,启蒙运动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2](4)},确立理性原则和自由精神,这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内涵及行动,不仅具有真实的内容和意义,而且推动了政治解放和历史进步,把人类信仰从“天神时代”推向“物神时代”,给无产阶级带来了教育元素和革命启蒙,也使自身原则和信条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

但是,正如“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不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样,后者也并不直接就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一个时代性的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却不是一个直接就能匹配统治阶级政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事实。这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特别是政治革命的疾风骤雨、电光石火来说，有一定的理论滞后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意识领域有着自身的构造规律和传播条件，加之旧政权被推翻并不意味着其意识形态马上就失去了支配地位，特别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对人们产生了相当长时间的思想影响以致不少观点都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代表新政权思想原则的意识形态要想在短时期内就全面地取而代之是不可能的。比如即便“上帝死了”被理性证明和宣判，科学也揭穿了神学和宗教幻想，实现了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也仅仅是把宗教信仰“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既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2](32)}。只有等到资产阶级全面掌握了社会权力、文宣传媒系统等精神生产资料与思想调节手段之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才能全面进入现代社会的一切领域，并在与宗教传统的意识形态杂糅中编造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千方百计地影响和塑造这个“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2](551)}，才逐渐在社会意识领域取得支配性优势，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尽管这个世界历史意义带来了世界历史性的精神殖民和抽象痛苦。

四、意识形态的运行规律：把观念装进头脑

既然是精神殖民和抽象痛苦，为何还有世界历史意义？换言之，既然宗教是幻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有诸多假象和幻想，为何这些幻想还能塞进人们的头脑呢？人们究竟是怎样把这些意识形态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对这个导向“哲学革命”和“术语革命”前提问题的追问和回答，关涉意识形态运行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

位的精神力量。”^{[2](550-551)}意识形态把观念装进头脑的运行规律，隐藏在这个历史事实及其发生原理之中。其一，统治阶级往往同时支配着一定社会时代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其他社会成员由于没有掌握这些生产资料只能隶属其中，从而这些人的思想在根本上讲也是由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决定的。其二，这种决定关系也会获得自己的思想秩序和统治意志，它表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在思想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中表达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它同时也表明，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一旦表现在观念原则和思想权力上，就会以“统治阶级的思想”面貌和权威出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551)}，从而可以更加容易地“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更加有效地把“统治阶级的思想”，认定并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如此看来，意识形态能把一个阶级的思想变成“统治阶级的思想”并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它全面掌握着一定社会时代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它让那些没有支配这些生产资料的社会成员，要想维系生存、融入社会，就必须承认和从属于自己阶级构筑的统治关系及其意识形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和服务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家，“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2](552)}，既编造出关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幻想，也编造出“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个整个假象”^{[2](553)}，以及一定时代的支配关系似乎只是表明“概念”“观念”“精神”在进行统治的幻想。唯心史观就是这样考察并书写历史的，它们总是从概念和抽象的绝对原则出发，先在历史中寻找某个特定的范畴，然后神秘兮兮地宣布正是这个范畴创造和支配了历史。唯心史观不仅为自己制造幻想，而且相信这些幻想，“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

概相信”^[2](555)]。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考察方式的实质是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也就是“使这些思想独立化”了,因此“历史编纂学家”们不过是在“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不过是在硬说世界受“上帝创世”“君权神授”或者“天赋人权”等伟大观念支配——“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2](552)]

但是这些“硬说”出来的“幻想”,不仅意识形态家们相信,而且统治阶级也相信,自然也就要求被统治阶级予以认同和相信。历史表明,正如教皇、国王和他们的信徒及子民,对“上帝的仁爱”“君上的美德”有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理解领会那样,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和感受也有很大的不同。虽然社会各阶级成员对这些意识形态幻想的理解和相信存在立场与程度上的差异,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确实都在相信并追求着某种所谓“共同的目标”——意识形态构造的虚假理想和统治愿望,尽管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阶级斗争和现实冲突,只不过后者被前者掩盖起来或者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回到开始的问题,这种幻想是怎样被“塞进头脑”并获得认同相信的呢?资产阶级的现代幻想既然是精神殖民和抽象痛苦,为何还有世界历史意义?这种意识形态服从结构是怎么造成的?诚然,路易·阿尔都塞指认的各个时代存在的“意识形态及其与之相适合的结构”,诸如教会、学校、家庭等“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6](183)],为解释这个意识形态运行过程提供了“物质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说明。意识形态的主体化往往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体化,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之相适应和匹配,思想政治教育建构着一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教化体系。但是,这并不表明“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6](357)],尽管意识形态总是构筑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总要凭借一定的物质力量发挥作用,却改变不了意识形态没有独立

外观的历史本质和理论真相。这就意味着,造成意识形态服从结构的原因不在幻想自身,而在构造这个意识形态幻想的经济关系和物质力量之中,并且正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550)]这个建构机制,把意识形态的幻想塞进了人们的头脑,也让资产阶级的现代幻想造成了具有世界历史属性的精神殖民和抽象痛苦。“颠倒的世界”产生了“颠倒的世界观”,“抽象的活动”伴随着“抽象的痛苦”。

具体而言,秘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里:“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2](550)]人们经常在这里产生误会,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只是由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家发明编造出来的,似乎被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员就不能产生跟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相类似甚至一致的思想观念,似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不能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为自己服务。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指出在罗马帝国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制定和颁布“尼西亚信条”之前,基督教一开始正是由底层民众创造并在广大下层人民当中得到普遍传播的就足够了。基督教作为抚慰苦难和支撑精神的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影响罗马皇帝和僧侣等级联合起来将这个曾经具有“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的民间意识形态改造成为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同样,资产阶级在反抗封建贵族时对基督教采取的激进批判态度和坚决改革行动,也完全没有影响他们在确立自身统治地位后,重新利用宗教工具和笃诚信仰来进行阶级压迫、殖民掠夺。可见,所有阶级都能制造意识形态,尽管不是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能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但是所有阶级的思想都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意识形态渴望,因而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着观念颠倒和虚假意识,那么这种歪曲性和幻想性的意识形态现象对于所有的阶级都是适用的。所以,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内,不仅

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家们，而且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其他社会成员，都在共同相信并追求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幻想。

这是为什么呢？归根结底，这是“有限的物质活动方式”^{[2](524)}造成的认知结果。一方面，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虚幻”的共同利益在起初之时并不都是虚假的，也有真实的内容和意义、愿望和意志，比如文艺复兴、理性启蒙、宗教改革和政治解放，这些意识形态幻想中也有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部分心声、共同原则。只不过好景不长，“当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压迫被统治阶级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之时，这种‘虚幻’就被粉碎了。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阶级也很难提出具有充分自主性的思想，因为他们缺乏思想生产手段，同时主导社会关系也给他们套上了枷锁”^{[1](23)}。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被统治阶级不能支配该时代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可避免地隶属于统治阶级。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观察思考这个时代的现实关系时，“观察什么”“思考什么”“怎么思考”往往都是由统治阶级掌握的生产资料决定着，因而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颠倒和歪曲的地方，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般来说也很难不发生同样的颠倒和歪曲。在这种情况下，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关于该时代的总体认识具有趋同性，从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和虚幻性就被掩盖起来、接受下来，以致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信奉的观念原则中存在着颠倒和歪曲，意识形态的幻想也就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心甘情愿地塞进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人们已经这样做了。如果人们这样去做，那么就会形成关于这些意识形态幻想的社会无意识、群体无意识和个体认知窠臼，进而塑造出由这些意识形态幻想或明或暗支配着的社会心理、群体习惯和个体信念。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如果仅仅考察流通领域这个表象世界，就容易产生“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7](204)}等意识形态幻想，就容易将这种幻想固化为抽象的教义和普

世的信条，并千方百计地将之推广到世界各地。实际上，一旦深入这些“普世信条”掩盖的市民社会生活内部，就是说一旦穿过现象界的流通领域，进到本质界的生产领域，马上就会看到所谓“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不过是工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资本支配劳动的形式平等、资本家对工人及其产品的所有权，以及为了最大利润可以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动机和殖民主义行径。但是这些本质深处的颠倒世界却制造了“所谓文明”的外观，因为它被流通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同时产生并迅速滥觞、表现为诸种形态的商品拜物教掩盖起来；使置身其中的现实个人不仅难以察觉，而且容易习以为常、逆来顺受，被世界历史抛入现代性的抽象力量和支配秩序之中，以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既无处藏身，又无法抽身，既无处出走，又无家可归。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揭开了谜底、破除了幻象、指明了理想，为人类解放开辟了新的文明路向，现实个人的解放运动才被提升到了“原则高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因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幻想才能追随着商品和资本在全世界遨游兜售，并愈发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原则和价值灌输。当然这种意识形态输出是在枪炮和征服的野蛮加持下进行的，就像殖民主义者总是先以“传道士”的名义出场，再以“卫道士”的荣誉收场那样。这个意识形态事件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现代化的成果”和“现代性的后果”相伴而生，精神殖民既有改变愚昧、突破传统、瓦解桎梏的文明喜悦和历史进步，也有主权丧失、民族梦幻、生命物化的百年孤独与抽象痛苦。资本主义在把“历史”变成“世界历史”的同时，也把自身精神变成了殖民精神，把相对幻想变成了绝对幻想，导致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合谋的统治秩序，给处于“物的依赖关系”时代条件下的现实个人，带来了“异化的信仰”和“抽象的痛苦”。直到历史唯物主义出场，才科学地揭穿了这个意识形态幻想以及构造这个幻想、造成抽象统治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如果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颠

倒,那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对这种“颠倒的颠倒”。在这种批判性的颠倒和肯定性的建构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实现了阶级意识、意识形态、科学三者相一致,尽管也要将自身利益说成普遍利益,但是“说成”在这里并非“思辨的胡说”,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尽管也要力求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但这不是为了剥削统治,而是为了最终取消任何形式的统治;尽管也要将观念装进人们的头脑,但这不是愚民教化,而是要用“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素朴的人民园地”^{[2](17)},加强理论武装、保持政治清醒、笃定革命理想,真正致力于“普遍的人的解放”^{[2](14)},展现出国家运用意识形态力量引领保障社会发展的例外逻辑、真理品质和人民立场。

参考文献:

- [1] 乔治·拉雷恩. 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M]. 张秀琴,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路易·阿尔都塞. 论再生产[M]. 吴子枫,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Ideas of ideology in *The German Ideology*

ZHONG Qido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German Ideology* is a key text that witnesses the simultaneous occurrence and mutual reinforcement of the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erminology revolution of ideological theory. It is the ideological criticism that led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troversi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views of ideolog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original text did not provide a clear expression or definition of the essential concept of ideology, there would be no one who would doubt the special importance of using this text to grasp and interpret the internal logic of ideolo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fact, it is within the negative ideological critique (that is, both the criticism of German ideology and ideology in general) that Marx and Engels established the affirmativ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 source of generation,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functional structures, and its governing law, they profoundly uncover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deology that "material production determines spiritual production", that "idea-ruling is to put the very interest as the common interest of all", that "the ideas of the ruling class are in every epoch the ruling ideas", and that "ideas are made up and put into mind", all of which laid down the conceptual principles and spiritual concepts of the Marxist ideological theory.

Key Words: Marx; Engel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deology; law

[编辑: 胡兴华]